



##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后记

时间: 2005-11-13 10:20:07 来源: 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作者: 张邦炜 阅读1710次

不同学科自有各自不同的特性。就文史学科而言,老一辈做学问,不是靠财力的投入,而是靠精力的专注。他们将坐得住视为做学问的第一要义,总是强调水滴石穿之功、铁杵成针之力。并告诫后辈,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他们不相信经费的多少与学问的大小成正比。记得,20年前,一位已故文史学界前辈曾说:“不花国家一分钱,照样搞科研。”此言流露出他对新情况的不理解,然而如今学界已习以为常。眼下,但凡所谓学术著作,不管有无价值、价值究竟有多大,多半都由财政拨款资助出版。要得到资助,光填申报表不行,还要舍得跑。经费、项目要跑,发稿、职称、获奖、学位点之类也要跑,凡事都得跑。由静而动,从坐得住到舍得跑,此乃文史学界一大变迁。不少传统时代的老皇历也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形势,如果抱残守缺,一切按照老前辈的老经验办事,难免会落伍。需要说明的是,与现今大多数所谓学术著作一样,我这本书也是花纳税人的钱印出来的。能得到这笔钱则承蒙四川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梁守勋先生的关心、我系系主任杨天宏教授的支持和我校科研处副处长庾光蓉女士的奔波。谨在此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斗酒纵观廿一史,炉香静对十三经。”这句史可法的联语是我青年时代的座右铭,然而只是将它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作为美好愿望。我真可谓生不逢时,这辈子能坐下来认真读书的时间实在不多。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的。上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我出生在川南小县江安。当时,日本侵略军正对四川地区实行狂轰滥炸。母亲告诉我,我出生时,恰逢躲警报,既不是生在家中,更不是生在医院,而是生在乡下,生在茅屋里。我的名字邦炜,是曹禺先生取的。[1]他正随其执教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为躲避战祸而内迁四川江安,寄居我祖父家——江安迺庐。当时人们更多地叫他万家宝,他年纪比我父亲稍长,我叫他伯伯,他叫我炜炜。何谓炜炜,兴盛的样子也。而邦炜即是国家强盛的意思。这是国难深重年代,举国上下的热切企盼。五岁那年,抗战胜利,普天同庆,我同小伙伴们兴高采烈,上街耍龙灯、放鞭炮。这是我一生中记得清楚的第一件事。然而八年抗战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和平建国的开始,民众面对的是兵连祸结的时局。我亲眼目睹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的情景,以及那时出现的种种怪现状。如通货膨胀,什么金圆卷、银元卷、关金券,花样翻新,我跟随大人扛着一麻袋又一麻袋旧币去兑换为数量极少的新币。又如以物易物,母亲当教师,薪水不发钞票而发大米,人们出门不带钱而带米,过渡不收钱而收米。“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如此严酷的局面再度成为现实。何况我儿时是个活泼得近乎于得了好动症的顽童,书更不可能读好。年纪渐渐长大,国家才进入和平年代。

我的大学生阶段是在政治运动中度过的。反右那年进大学,又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红专辩论、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毕业时,灾荒年已降临。政治运动太多,本来就坐不住。何况如果认真读书,很可能被视为“只专不红”,扣上白旗帽子。1958年我就有戴白旗帽子的经历,所幸第二年即平反。三年研究生,三年灾荒年,但因不搞政治运动,连体育运动也停止,反倒读了些书。

研究生阶段,我研习宋史,《宋史》、《通考》、《长编》、《会要》等基本史料书非认真阅读不可,并应逐步通读。这些书当时没有新式标点本,只能读线装本。线装书之外,主要读理论书。先师金宝祥教授有理论派之称,反复强调马、恩的书是望远镜、显微镜,给人们以抽象力、洞察力。[2]他主张用《资本论》的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批评我爱读线装书,不读马、恩的书,永远不会有长进。直至其晚年还一再告诫我,读历史读不出哲学的意境来是可悲的。[3]老师当年认为,马克思解剖资本主义社会从商品入手,我们剖析中国封建社会应当以人身依附关系为重点,人身依附是封建社会最普遍的关系、“最内部的秘密”、“隐蔽着的基础”。[4]基于这一认识,老师叫我研习北宋租佃关系问题。我是老师的不肖弟子,理性思维能力差,深感马、恩书难啃,硬着头皮读,也无非是寻章摘句,或者死抠名词概念而已。我读马、恩的书,最大的收获是从恩格斯的《德国古代历史和语言》一书中找到一句话:“支配农民的租赋就远比支配他们的人身重要很多。”[5]并在1962年发表的习作《论宋代的官田》[6]中第一次引用。这句话成为我撰写毕业论文《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指导思想,阐述宋代佃农人身依附关系弱化的理论依据,剩下的任务就是在一摞又一摞线装书里去找史实依据了。至于抠名词,则有与束世澂先生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占有权”、“使用权”等概念的讨论。[7]

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都存在着不深不广的问题。宋史研究又是其薄弱环节,有关论著既少,又难找。就断代史来说,只有40年代出版的两本不完备的小册子。一本是金毓黻先生的《宋辽金史》第一册,我偶然在旧书摊上买到。另一本是张孟伦先生的《宋代兴亡史》,孟伦先生虽然是我的《中国历史文选》课授业师,但当年我始终未能找到这本书。其实,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宋辽金夏元》还稍许完备些。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当年是不能看的。张荫麟、邓广铭、陈乐素、聂崇岐、陈述、傅乐焕等先生的论文,我是在纸张已发黄的《清华学报》、《史语所集刊》、《浙江学报》、《燕京学报》上读到的。有时在《东洋史研究》、

《史学杂志》等日文期刊上读到周藤吉之、柳田节子先生的论文。记得，当时在四川大学读研究生的朱瑞熙先生借给我一本曾我部静雄的日文版《宋代政经史研究》看，我高兴得喜出望外。兰州书籍较少，1963年初春专程到北京查阅资料，每天早出晚归，从鲜鱼口到天津街，也只不过在北图读到些现在不让人看的善本线装书而已。日本学者加藤繁的《中国经济史考证》及《宫崎市定论文选集》因新近翻译出版，最容易找到，我也读得最认真。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前者的唐宋庄园论和后者的唐宋变革论。加藤繁的唐宋庄园论一度影响很大，有先生又将其发展为宋代是个无处无庄园的庄园世界，宋代庄园的性质为农奴制，它在经济上是与外界无往还的绝缘体。对于此论，我不以为然，并在《论宋代的官田》一文中表述了自己的浅见：宋代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不是庄园，而是租佃；宋代庄园的实质不是农奴制，而是租佃制。1963年岁尾，欣喜地读到邓广铭先生的大作《唐宋庄园制度质疑》，对于其基本论点，我非常赞同。如今唐宋庄园论似乎已无传播者和支持者。至于宫崎市定的唐宋变革论，实话实说，对我影响颇大。虽然我既不赞成宫崎将唐宋社会变革定位为从中世到近世的转化，也不赞同宫崎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并引发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但在其影响下，我逐渐对唐宋社会变革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认识。诸如：唐宋之际确实发生了一场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变革，宋代是与魏晋南北朝乃至唐代不尽相同的历史新阶段，如果说魏晋“尚姓”，唐代既“尚姓”又“尚官”，那么宋代则“尚官”，换言之，社会从以门阀为中心转化为以品官为本位；唐宋社会变革不是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它不是以突变的形式出现，而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渐进过程，前后经历了两三百之久，大致开始于中唐前后，基本完成于北宋前期，可简要地表述为唐宋之际；这场社会变革不是下降型的转化，而是上升型的运动，并不意味着停滞，而意味着发展，宋代进入了继续发展、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新阶段。而我的毕业论文只不过是土地制度的角度去初步论证唐宋社会变革而已。

正当我沉醉于西方马、恩洋装书和本土唐、宋故纸堆之际，提倡“厚今薄古”、反对“厚古薄今”的舆论导向仿佛将我从甜蜜的美梦中惊醒。政治运动靡即再起并升级。1965年10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来信要我将《北宋租佃关系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8]参照孙毓棠先生的审稿意见修改，尽快寄回发表时，我已在酒泉乡下搞“四清”。次年春天，《历史研究》即停刊，而我已远走西藏，并且一呆便是15年。后来，陈乐素先生批评我：“您在西藏15年，是十分难得的大好机会。藏学是绝学，您不学藏文，不搞藏学，仍搞宋史，是您一生中最大的失误。”乐素先生此言颇有道理，然而当时正值“文革”，根本不是做学问的环境。即使搞宋史，条件也不具备，《长编》、《会要》这类书籍在当年的西藏是无法找到的。工余之暇，我开始通读廿四史，这个原本可以完成的计划因故未能完成。当时的口号是：“长期建藏，边疆为家”；“死在西藏，埋在西藏。”我没有想到后来还有可能回家乡，教历史。1980年，奉调到四川师大历史系任教后，才在教学之余，又研习宋史，但学业已荒疏。

值得庆幸的是，80年代前期，我得到两次难得的再学习机会。一次是1983年春天，经友人朱瑞熙先生推荐，到上海师大，在程应镠先生主持下，参与审定《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与徐规、颜克述等前辈学者在一起紧张地工作，深受教益。另一次是1985年上半年，经友人贾大泉先生介绍，与郦家驹先生认识，由家驹先生提供方便，以合作整理《宋会要》为名，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访问，并得到陈智超、王曾瑜、吴泰等朋辈先进的关照，获益良多。在京期间，除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写些中国法制史方面的条目外，一心扑在读书上。离京返川时，家驹先生专门请我到家中，劝我不要走，就留在历史所，调动问题由他负责，令我十分感激。但这在当时并不现实，我依旧回学校，以教书为职业。

整个80年代，我在课余之暇，主要继续思索唐宋社会变革问题，并试图将其细化、深化、具体化。于是写下《论北宋“取士不问家世”》、《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试论宋代“婚姻不问阀阅”》、《宋代的“榜下择婿”之风》、《两宋时期的社会流动》等文。《取士》、《不成熟性》两文从选举制度的变革切入，力图论证唐代处于半门阀、半官僚政治阶段，经过唐代的过渡，到了宋代，历史的车轮已迈过严格的门阀政治时期，进入了典型的官僚政治阶段。《婚姻》、《择婿》两文则试图说明魏晋乃至隋唐是极端讲究门当户对的时期，而“议亲贵人相当”即择婿并不特别注重家庭的现实状况，转而尤其看重本人的未来前程，则意味着两宋是相当标准的郎才女貌时代。然而我并未将这个问题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究其原因，大致有二：首先是由于本人理论水平有限。据说漆侠先生生前曾说，历史研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水平的高低。此说击中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的要害，对后辈具有警示意义。其次是因为参与其他项目，如撰写《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9]合著《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编写《中国大通史·两宋卷·社会生活编》以及参与近世家族与社会课题的研究等。其中某些项目与唐宋社会变革关系不大，我的探索视线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不免有所转移。在完成上述项目的同时，产生了一些副产品。如《宋代皇亲与政治》一书即是《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的副产品，更多的则是论文。本书便是这些论文的选集。60、70年代的论文因其重点与风格和80年代以后明显不同，未选入本书。80年代以后写的一些通俗性文章如《范仲淹的晚节》、《王安石的重禄法》、《宋代的神童》等，评论性文章如《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宋史研究》、《嘉惠学界，流传久远——〈全宋文〉评介》、《评〈宋朝阶级结构〉》、《读〈吴天墀文史存稿〉》等，回忆性文章如《风范永存——缅怀邓广铭先生》、《西行万里到拉萨》、《蒙老（文通先生）叫我读〈文鉴〉》等，也未选入本书。

岁月蹉跎，人生易老。继2003年出版个人论文集《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之后，再选编这本论文集，由以下三个因素所促成。一是因为同行询问，某些论文如《论宋代皇权与相权》等等，为什么未收入？二是由于有的论文很难找，如《宋代技术官研究》由黄宽重先生推荐，连载于台湾《大陆杂志》，以致有同行误以为这个问题从来无人问津。三是梁守勋先生去年即许诺资助本书出版，于是我已骑在虎背，不得下骑。

本书的编辑原则与《宋代婚姻家族史论》相同，诸如文稿大体保持原貌，仅作技术性处理，注释一律统一为文末注，核查引文时采用了一些新近出版的古籍之类，恕不赘述。至于核查、校对等方面的事务，则由我系研究生吴其付、陈盈洁、卢俊勇、张翠方、李联聪及本科生吴菁菁、徐开艳等协助。笔者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也许与经历有关，我在学术上素来不敢自信。若干年前，中国宋史研究网站站长、河南大学刘坤太教授来函询问斋名与自语。我如实回答道：“我这个人糊里糊涂过日子，确无什么斋名。只因我对历史现象乃至社会现实都看不真切、道不明白，一切恍恍惚惚，如果一定要取个斋名，姑且名之曰恍惚斋。至于自语，暂且写下25个字：‘遇事洒脱些，做事认真些，待人坦诚些，性情开朗些，生活潇洒些。’”本书阐述的某些论点只怕属于恍惚斋老者的恍惚之论。好在有此一说：历史原本介乎于科学与艺术之间，不少历史结论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可争辩性。何况在朋辈的论著中又有多少不刊之论呢？或可聊以自慰！

注 释

- [1] 见田本相：《曹禺传》第18章《江安岁月》，第24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 [2] 老师当时强调马、恩，几乎不提列、斯，原因何在，他不讲，我们也不问。
- [3] 关于老师的治学理念与方法，可参看沈颂金：《历史研究与理性思维——金宝祥教授访谈录》，载《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魏明孔：《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载《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第517-525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 [4]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1033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5] 恩格斯：《德国古代历史和语言》第148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 [6] 张邦炜：《关于宋代佃农的身份问题》，载《光明日报》1965年8月11日《史学》。
- [7] 张邦炜：《论宋代的官田》，载《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62年第4期。
- [8] 后来连载于《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4期。
- [9] 系友人赵葆寓先生约我与他合作，我写北宋，他写南宋。谁知尚未动笔，他便一病不起。并在病中为我的《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写书评，题为《开拓宋史研究的新领域》，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而此文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篇著述。

1

新闻录入员：oldliu (共计 317 篇)

- 上一条：[《宋代政治文化史论》前言](#) (11-13)
- 下一条：[林文勋、谷更有著《唐宋乡村社会力量与基层控制》出版](#) (11-13)

相关专题：[张邦炜专辑](#)

相关信息：[张邦炜](#)

-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拨开春秋笔法的](#) (12-14)
- [宋代技术官研究\(续\)](#) (12-8)
- [宋代技术官研究](#) (12-7)
-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12-7)

[>>更多](#)

- [《宋代政治文化史论》：拨开春秋笔法的](#) (12-14)
- [宋代技术官研究\(续\)](#) (12-8)
- [宋代技术官研究](#) (12-7)
- [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 (12-7)

[>>更多](#)

Microsoft OLE DB Provider for ODBC Drivers 错误 '80040e21'

ODBC 驱动程序不支持所需的属性。